

# 我所認識的戴季陶先生 (選載)

羅家倫原著

自本誌刊載王成聖教授所撰「戴傳賢的一生」以來，獲得海內外讀者之熱烈反響，不少讀者函電要求多登一些有關戴氏的紀念文字。茲由讀者史君推介，特予選載故國史館館長羅家倫先生著：「我所認識的戴季陶先生」一文，春秋筆法，情文並茂，值得一讀再讀。

編者

四十多年的時光，恍彷彿像一轉眼似的過去，回想故交耆舊，能不感慨萬千？

我和戴季陶先生的最初見面，在民初四五年間，他在「天仇」時代，我還在上海讀書，並編輯「復旦」季刊，有時為報紙寫文章，曾經簡短的晤談幾次。民國七、八年間，我在北大參加新文化運動，和傅孟真先生編輯「新潮」，那時季陶先生在上海辦理民國日報，把附刊「覺悟」一版，首先改用白話文體，討論文化社會問題，遙遙呼應，於是他和孟真同我通過好幾次信，都是討論有關前項問題的，當時他對宗教問題的議論，甚為激烈。民國八年底，我因被北洋軍閥搜捕，遂由北京學生聯合會派往上海擔任一名代表，商量採取聯合行動，予軍閥以打擊。在滬期間，我和季陶先生與朱執信先生因為文字上的因緣，談天的機會頗多，那年的除夕，民國日報舉行全體員工一道聚餐，當時還屬創舉，不知何故，我以外客的身份被邀，祇覺季陶先生豪興百倍，酒多話多，他於酩酊之際，不知何故，聽到我說了一句話，認為不無可取，於是突然對我磕了一

個頭，使我惶恐到不知所措。我提到這些有趣的事情，因為現在大家談起季陶先生來，常是回想到他晚年莊嚴的道貌。悲憫的言論，而不常提到他雄姿英發、感情真摯的青年時代。

民國十六年春，國民革命軍克復南京以後，總司令行轅設在鐵湯池丁園，中央重要會議多在該處舉行，季陶先生和我都住在其中的一所樓房裏，於是常常請教。中央因為在清黨期間，亟需培養青年幹部人才，於是籌設中央黨務學校，派了九位籌備委員，季陶先生當然是其中的一位，我也忝預其列。籌備期間很短，以後中央任蔣先生為校長，季陶先生為教務主任。我為副主任，丁惟汾先生為訓育主任，谷正綱先生為副主任，陳果夫先生為總務主任，吳挹峯先生為副主任，因為校長不能常常到校，所以季陶先生的主張，常為學校大計所關。在那年的炎夏，他和我同在丁園裏費了三整天的時間，擬就第一期課程表，每項之下，都詳加說明，確是悉心討論的結果，在這階段中，我很佩服他的精密和虛心，我和他共事期間，尤其感謝他於彼此真正了解之後信任無

間之誠。例如：選聘教授一事，他完全付託給我，我親自帶名單去請問他的意見，他總是說「你對學術方面的人比我知道的多，而且你是嚴格和公正的，你辦好了」，我還是每次去看他，他總是這樣說。我是主張訓練青年要注重其基本的知識，和培養其厚重的品德，不可過於求速，所以黨校第一期畢業的期間，繼續延長兩次，在實際黨政的朋友們，因為迫切人事上的需要，持不同的主張，是當然的事，可是我的見解，終於得季陶先生的支持而通過，以後隔了兩年，政校改制，我重回該校主持教務，因為教育長丁惟汾先生需長期赴青島休養，中央命我兼代其職務，季陶先生改任校務委員，我提出校務委員會，將政校先改為二年半制，以後又改為四年制，稱為大學部（復員以後乃為政治大學），我的心中是想辦成一個倫敦大學的政治經濟學院（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）而兼具法國政治學校（L. Eco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）性質的學校（法國政治學校培養出若干普法戰爭後對於復興法國貢獻的人材，所以九

一八以後，我更有這種聯想），我爲這種主張，和季陶先生談了一個深夜，終於得到他的支持而達成。我要補充一句說，我和季陶先生，在若干見解上是不無出入的，而且有過劇烈的辯論，可是對於政校的教育方針上，我總是很感謝他能給我支持。還有一件有關邊疆教育的事件，我想也應該在此一提，在黨校初期，爲了邊疆青年升學的便利，曾附設一個蒙藏補習班，是臨時性的。後來同仁們都感覺到這個班很有意義，應當保持和擴充，於是我綜合大家的意見，在校務委員會中提出一個方案，將該班改爲附設蒙藏學校，這方案經季陶先生和陳果夫先生積極支持而成立。過了兩年，我們感覺邊患日亟，於是由我大膽的再擬一方案，將此校在邊疆各適當地點成立分校五處，定名爲中央政治學校附設蒙藏學校邊疆分校。一在綏遠的包頭，爲附近內外蒙青年求學便利；一在甘肅的酒泉，爲河西和新疆（當時尚非中央力量所及）青年求學便利；一在青海的西寧，爲青海及隴西一帶青年求學便利；一在西康的康定，爲康藏青年求學便利；一在雲南的大理，爲滇西各地青年求學便利。這計劃是相當大而費錢的，我首先面交季陶先生審查，並加以說明，他看了興奮異常，尤其贊成我選擇的地點，在抗戰以前，這計劃已經次第實行，受過這本分各學校教育的邊疆青年有好幾千人，沒有季陶先生的贊助，和陳果夫先生的籌劃經費，在當時情形之下，可以說是很難完成（因爲在臺黨、政、邊三校畢業同學要求我敘述季陶先生對於各該校的關係，所以我祇能就個人與季陶先生親自接觸的事，

據實寫下來，並不是要把自己拉進去，我想這是大家可能諒解的）。

但是我們最後不能不寫一件我認爲是季陶先生生平最可佩服的事，也是一件在中國近代史上有決定性的大事。這件事發生在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到達南京的晚上，當天下午這件荒謬離奇的意外消息傳到南京，中央黨部立即召集在京的中央委員和政治會議委員開臨時緊急會議；災區傳來的消息非常簡略，真像自無從判斷，全國震驚，訛言百出，在中央的人不但義憤填膺，悲痛萬狀，而且大家公共爲國的同仇和私人愛戴的忠忱，交織成爲理智和感情無從分辨、無法形容的情況，在會議場中討論復討論，假設復假設，分析，一小時，兩小時，三小時，四小時……的過去，當然有主張立正紀綱討伐叛逆的，也有主張與叛逆妥洽者，會場的辯論，與場外的電話，復不斷的互爲影響，加之不斷的相反的謠言，更使人無從判斷，無所適從，其中有忠勇的軍人，却因身份關係而不敢作主張；有歷史悠久的同志，却因有所避諱而不肯作主張；有敢作主張的同志，又因年事資歷關係，雖有主張而無從貫徹；總之，遇此非常事變，許多學問膽識不够的人，根本就拿不出主張來，座到子夜一時，二時還無從得到決定，忽然季陶先生站起來了，他的神態簡直像瘋狂一般，他大聲疾呼的主張討伐，他激昂地說，現在委員長的吉凶未卜，若是不幸而爲凶，則我們還去和叛逆妥洽，豈不是白白的上了他的當，乃至將來無法申大義討國賊，若是委員長還是安全的話，則我們用向綁匪贖票的

方式將委員長救出來，則委員長又將何以統帥三軍，領導全國？現在我們祇有劍及履及的討逆，才能挽救主帥的生命，挽救革命的事業，總理遺留下來的革命事業和委員長一生爲革命奮鬥的偉大成果，斷不能因爲這次西安事變便毀滅了。他說，「我要警告大家，若是今晚我們中央不能決定討逆的大計，明天全國立刻大亂！政府也垮了！大局無法收拾！我們何面目對總理！何面目對蔣先生！」他說這番話的時候，眼睛也紅了！聲音也嘶啞了！這番話却決定了國家大計！於是全體一致的通過下討伐令，任命何應欽先生爲討逆總司令，于右任先生爲宣撫使宣慰西北軍民。這一件歷史上重大的決定，本着「喪君有君」的春秋大義，也是明代于忠肅挽回土木之變成爲一代社稷名臣的見解與風骨，不是真正的讀書人，決不能有此膽識！這件事現在還有許多在場的朋友可以證明！這件事使季陶先生真正不朽。

## 關山煙塵記

喬家才 著

全書五百多頁三十五萬字定價肆拾捌元請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，附郵票肆拾捌元寄中外雜誌社，立即按址寄書（平郵免收寄費掛號加叁元）